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六期 ——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1c)

【读书笔记】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若干史实辨正	卜伟华
【往事如烟】	“救鬼”	叶志江
【往事追忆】	康生整人目击记	戴维堤
【难忘岁月】	我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梁守福
【自由论坛】	平民阶层的文革史提纲 (草稿)	老 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读书笔记】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若干史实辨正

• 卜伟华 •

《炎黄春秋》杂志 2 0 0 8 年第 1 2 期刊登了阎阳生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阎阳生是我的校友、学长、老朋友，最近几年和我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现在热衷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有一些作品陆续发表。我读到的有《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蒯大富访谈录》等。

阎阳生几年来采访了不少清华附中的当事人，有原来的学校领导人，也有老师和同学。他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人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了解红卫兵这方面的情况，他与当年对立的组织的人员也能很好地交流。他收集、整理的各种新鲜的史料，不但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华附中文革历史，而且也会对整个文革研究和红卫兵运动研究做出贡献。

阎阳生生性活泼，才华横溢，享有 1 9 7 7 年高考“作文状元”的美誉。他写的东西常有奇思妙想，灵光闪现，但有时又大而化之，不拘细节，难免出现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他的这篇《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以下简称《1 0 0 天》）就是他这种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现。

事隔40多年，记忆都会模糊，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当年历史的描述。我很同意阎阳生说的一句话：“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基于这个认识，我对该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择其要者作些辨析和订正，有不妥之处，还望阎阳生和其他有识之士指正。

一、《100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什么叫“独立的生命期”？文中未作解释。我且将它理解为“独立存在的时间”。按这种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从1966年5月29日成立到8月27日发表《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按100天计算，也就是到9月5日为止。

我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至少应该从1966年5月29日到1968年年底，也就是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成员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为止。在这之前，并未发生这个组织解散或与其他组织合并之类的事情。卜大华曾经说过：“我们是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意思是说，从1966年5月底到9月中，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左派，以后就逐渐成了右派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和“100天”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不能说当左派时存在，当右派时就不存在了。

红卫兵中有些人确实较早地脱离了运动。但在那个时候，真正想完全脱离运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拿阎阳生本人来说，他是较早地离开了学校，但也未能完全脱离运动。1967年1月，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名义发表的《评〈出身论〉》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

1966年9月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活动有：

1966年“十一”前后，接待多批外国代表团和记者。

11月底，与海淀区十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2月，参与筹备和组织“联动”的几次大会。

1967年4月22日释放“联动”后，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

11月，红卫兵开展对“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并于11月8日发表《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判《人民日报》10月25日的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中旬，陈伯达、谢富治专门到清华附中向红卫兵“请教”关于“教育革命”问题。

1968年3月23日，与清华附中井冈山部分人员发生小规模武斗。

5、6月，与井冈山发生武斗。

8至10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进行关于“大联合”的谈判，最终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

二、《100天》中说“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

阎阳生把创立预科说成是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推行与毛泽东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的标志，这是不对的。第一，在创办预科问题上夸大了万邦儒的作用，第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办预科的方向就是和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

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1964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90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641班和预642班。1965年9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建立了预651班和预652班。

《100天》中说：“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其实也不尽然。1965年2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预科只是试办，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一届预科学生毕业，究竟一个预科班的学生能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大学，也还是未知数。

三、《100天》中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可以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是比较多的，但他们是否就可以称作清华附中的核心？而且在这两部分人当中，也并不都具有“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的秉性。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都称作是有“中产阶级知识背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说法。我认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还谈不上存在着中产阶级。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发展，在清华附中，不同出身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和矛盾，但直到1966年春，在全校学生中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以出身划分的两派。作者举了1964年“娄熊打架事件”来证明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了以出身划分的两派。当年此事确实轰动全校，食堂里出了不少大字报。但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上，并不完全是以出身决定观点，反倒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对熊刚提出了批评。

四、《100天》中说：“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毛泽东主持的，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并未出席会议。

《100天》中说：“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6月3日的会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这个会议的范围要比前者小多了。

《100天》中说“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是在6月1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发表在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100天》中在谈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时说：“正是（8月18日的）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 8 月 12 日即已闭幕。

五、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作者说，对于红卫兵成立于 5 月 29 日这一说法，“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并举出卜大华的话作为证据。

据我了解，卜大华对红卫兵成立日期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在 1966 年 5 月 29 日成立的。

5 月 29 日是星期日，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宋柏林那天也回家了，所以他没有参加当天的圆明园会议，在他的日记中只记述了他在家与妈妈谈话的情况。

至于宋柏林 6 月 3 日的日记内容，不能判定是指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事情，卜大华说他不知道那天“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之事。或许宋柏林记录了他们班（高 631 班）的事情也未可知。

阎阳生所说：“6 月 1 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 5 月 29 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 月 1 日傍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贴出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合乎情理。但关于各班的代表决定把 5 月 29 日定为红卫兵成立日却是一个新的说法。据我所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此前还没有人这样说过。

六、《100 天》中引用了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在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 月初，红卫兵确实处于孤立状态，大多数学生很自然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对红卫兵进行批评。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领导人并没有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去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对红卫兵进行反击。在红卫兵和反对红卫兵的不同人群中，都没有关于此事的回忆。如果当时学校领导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 6 月 8 日工作组进校，形势反转后，定会成为校领导一条重要的罪状被揭发和批判，但我在学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揭发和批判的大字报。

七、《100 天》中说：“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派知道了红卫兵。”

据我判断，这里所说的“通报”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6 月 1 日公布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北京市的教育系统包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乱了套了，教育系统和各学校的领导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大风暴都是准备不足、自顾不暇。许多学校的领导人在还没有弄清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第二，极少数的学校在 6 月初就进了工作组（如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在内的大多数学校都是在 6 月 8 日以后才进驻了工作组。所以不会是工作组写的通报。第三，我曾经对北京市运动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查阅，但从没见过此种通报。

八、《100 天》中说：“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

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经查，1966年9月编辑印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大字报选》中保存有宣夏芳的大字报全文。

宣夏芳大字报的题目是《致十三中、人大附中的“革干子弟们”》。其有关段落的原文为：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和你们有异议，你们口出大言说：‘谁敢动我们红卫兵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来头之大，来势之猛，倒也罕见，不过并不稀奇！谁敢？我就敢！我们全校真正革命同学都敢！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动！还要反！坚决反！彻底反！反到底！管你什么‘红卫兵’‘黑卫兵’都不例外，你们这些强大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

“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这一句，原文无。

为什么阎阳生的引文和原文差距那么大呢？后来我发现，他是偷懒照抄了别人的不准确的引文所致。

原清华附中预651班学生，现旅德学者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中说：“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仲维光身在国外，要找原文会有困难，只能凭记忆写来，倒也情有可原，阎阳生完全有条件查到原文，可能他手边也会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本小册子，为什么就不好好翻一翻呢？

原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郑光召（现用名郑义），在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一文中也提到了宣夏芳。郑在文中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说得更玄了：“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郑在文中并没有解释他的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材料。

九、《100天》中说，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6月9日开的。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用过这种说法。

现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判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在当天晚上，即6月8日晚上召开的。其中最有力的根据是刘晋的回忆。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

十、《100天》中说：“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阎阳生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刘晋。

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刘晋的记忆有误。1966年6月下旬，运动才刚刚开始不久，中央刚宣布停课半年搞运动，根本不可能有“复课闹革命”的提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1967年3月份才提出来的。

对红卫兵等组织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是有的。6月27日，胡克实在听取刘晋的汇报后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

十一、《100天》中说：“当高二的红卫兵刘刚、张庶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

刘刚和张庶平都是清华附中高656班的学生，张庶平是红卫兵的成员，而刘刚不是。刘刚后来成为红卫兵对立面组织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

《100天》中说：蒯大富是在刘刚的帮助下，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的。

这太夸大了刘刚对蒯大富的作用了。

十二、《100天》中说宋柏林7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批判班主任丁淑慧的内容，实际上，宋柏林是在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的高631班批判、斗争丁淑慧一事。

《100天》中将红卫兵与工作组摊牌的日期写成7月24日，明显是记错了。当时的说法是开交心会，时间是在7月18日晚上。这个内容在宋柏林日记中有记载（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98页）。而且，卜大华、高洪旭等红卫兵负责人在7月24日时已经到河北的沙城军训去了。

《100天》谈到冯玉中时，将他的职务写成“政治主任”，显然不对，冯玉中是清华附中的教务处副主任。

《100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

此说不确。高中二年级的阎阳生本人就出生于1947年，1966年他也有19岁了。估计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中或许还会有比他年纪更大的。

十三、《100天》中说：7月27日，“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

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6年6月初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沿用了所谓“王力罢了周杰的官”的说法，有的地方用了“王力遵照江青的命令去罢了周杰的官”。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据王力本人晚年回忆，派他和吴德到北京展览馆去支持彭小蒙，罢周杰的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11页）

十四、《100天》中说：“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手抄件”。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也没说清楚是毛泽东的手抄件，还是王任重的手抄件，还是秘书的手抄件。

王铭、卜大华在王任重那里看到的是铅印的中央文件，即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亲笔原件从未见披露。在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刊载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手抄件的第一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5页），该手抄件字迹明显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在这份抄件上有几处小的修改。

十五、《100天》中说：“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

文中的“Y”，即清华附中高652班的杨爱伦。她在8月8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杨自杀的消息是在接到五道口派出所的电话后才知道的。但据我向高652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

十六、《100天》在谈到校园暴力时说：“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

“清华附中模式”一词是由旅美学者王友琴首先使用的。王友琴在研究文革中的暴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她所调查了解的材料对人们了解文革中的最残忍、黑暗的一面会有帮助。但她的调查和研究也存在一些急于求成和不够准确的问题。（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中就有诸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未死时，告诉医院郭是“右派学生”，遂使郭不治而死等道听途说来的不实之词。）

王友琴认为，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校园暴力，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

应该承认，工作组撤出以后，发生在清华附中的各种暴力行动，红卫兵作为当时的掌权者，是应该负责的。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对打人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这从8月6日发表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和8月27日发表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就可以看到。

十七、《100天》在谈到《十点估计》时说：“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刘树华的死是与打人风潮有关的，据清华附中教师中当时的革委会成员刘长生证实，刘树

华确实曾经遭到殴打。

郭兰蕙的自杀身亡却与打人风潮没有直接的关系。郭兰蕙生性内向，身处一个单亲家庭，在清华附中曾经留了一级，很少与其他同学交流。在她自杀前，并没有出现批斗她或给她贴大字报的情况。按现在的说法，她自杀的原因有可能是抑郁症。郭兰蕙自杀后，革委会曾派人到医院，要求医院尽全力抢救。但因郭是喝来苏水自杀，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终于抢救无效而死亡。

十八、《100天》在结尾时谈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这个说法不清楚：到底是调查了全校学生还是只抽查了部分学生？调查了多少人？“一半的大学生”是全校学生的一半还是答了问卷的学生（一百人？十人？二人？）中的一半？

无论这样的调查是否令人信服，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确实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同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 原载《记忆》第十期

~~~~~  
【往事如烟】

“救鬼”

• 叶志江 •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对清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当校党委书记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的消息传到清华后，被毛泽东斥之为“盘根错节”的清华党委“顷刻瓦解”。那天，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校团委书记方惠坚流着眼泪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犯错误了，也连累你犯了错误。”

大概是担心我在大风大浪中失足，六月一日后方惠坚和我几乎“形影不离”。他儒雅可亲，是我十分信赖的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贴出保卫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受到了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大会表扬，说我的大字报“很有说服力”。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我的罪状。

年仅二十一岁，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我无法猜测“犯错误”后会面临何种命运，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失去自由。我匆匆赶回家中看望了父母，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图书馆，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数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很多奋斗的梦，而如今头脑中只有一片空白。

当我回到学校时，中共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已进驻清华，美丽的清华园被革命的烈火燃烧得沸腾起来了。一夜间，各级党政干部、学术权威，乃至部分学生和教师都仿佛去阴曹地府领了封赏，一个个都头顶纸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我这个闻名全校的“高材生”，校党委的“红人”也被册封为“叶鬼”，成了革命群众最好的玩物。除了批斗，我被关押在宿舍里供人观赏和羞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下旬，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立脚未



稳的工作组。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主持下，工作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蒯”高潮，将蒯大富和一部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革命。于是，清华园中又冒出了许多“新鬼”。

一个多月后，这件事成为毛泽东整肃刘少奇的口实，工作组压制学生的作法被毛斥之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七月二十八日，工作组撤出清华，清华园从此“天下大乱”。

如同我两年后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客串了一出日后传为佳话的救美插曲一样（见本刊 z k 0 8 0 8 d，叶志江：“救美”），我在声势浩大的清华反蒯高潮中也客串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救鬼”闹剧。

我称之为“客串”，是因为这“武斗”和“反蒯”本来都和我毫不相干，但我偏要“轧一脚”，结果闹出很大的动静，还连累我的先后两位女友陪我一同受苦。

六月底的一天，我被两个学生押送到大字报区接受反蒯教育，并被要求写出大字报表明我对反蒯一事的立场。

我并未意识到革命群众采用的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在被关押了两个多星期后，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出来走一走。于是，我津津有味地欣赏起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来。

在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中，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两张。

一张是蒯大富本人的大字报，面对工作组泰山压顶式的压力，他居然声称高压政策的“效果等于零”，让我不免对他的勇气暗暗钦佩。

另一张《真三家店菜单》是反蒯的。它将大字报中的一些批判蒯大富的词汇巧妙地编排成一份菜单，读来令人莞尔。

文革期间，革命群众“创造”了十分丰富的对敌斗争词汇。有形容其凶恶的，如“狼心狗肺”、“血口喷人”；有形容其狡猾的，如“混水摸鱼”、“见风使舵”；也有形容其不老实交待问题或顽固不化的，如“鸡毛蒜皮”、“吞吞吐吐”和“花岗岩脑袋”等。

《真三家店菜单》就是将其中和食物相关的词汇列入菜单。“狼心狗肺”、“混水摸鱼”和“鸡毛蒜皮”等都成了“真三家店”的招牌菜。但有些词汇，如“煽风点火”、“见风使舵”等和食物无关，因而无法列入菜单。

三家店的名称来源于文革初期受到猛烈批判的《三家村札记》，其用意大概是将蒯大富和邓拓等“黑帮”人物拉扯在一起。

我当然无法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中弄清工作组和蒯大富之间谁是谁非。但这表态支持工作组的要求却是强制性的，我必须写点什么才能交差。

《真三家店菜单》和蒯大富“效果等于零”的名言诱使我写一篇文字游戏式的大字报。

我虽然是理工科学生，但却喜欢“玩弄”文字。一九六三年高考时，为了帮助同学记忆化学元素周期表，我将八个主要周期的元素谐音成两首“五言诗”。

周期表中第三和第七等四个周期二十个化学元素谐音成的诗被我取名“伤茜”(三七的谐音):

三七 伤茜  
硼铝镓铊 盆里加硬土 (我在花盆里加了点硬土)  
碳矽锗锡铅 叹息折细茜 (不小心折断了一颗小草)  
氮磷砷锑铋 但令升天边 (但愿你的灵魂升到天堂)  
氟氯溴碘砹 弗留休的哀 (不要留下你死亡的悲哀)

而第一和第六等四个周期二十个化学元素谐音成的诗被我取名“沿路”(一六的谐音):

一六 沿路  
锂钠钾铷铯 离那嘉路瑟 (离开了美丽的嘉路瑟城)  
铍镁钙锶钡 劈沫改驶北 (我们乘风破浪驶向北方)  
氧硫硒碲钋 杨柳溪抵舶 (当游船到达杨柳溪港口)  
氦氟氖氩氙 海内亚克西 (海面上传来歌声“亚克西”)

文革前夕,王洛宾的一首新疆民歌《亚克西》响彻全国。这“叹息折细茜”虽然有点小资情调,但“海内亚克西”一句却有时代气息。

我的这两首诗曾被中学同学竞相传抄,也使我至今能背出化学元素周期表。然而,三年后我故伎重演时,在处于文革阴云下的清华园里我的作品却被竞相批判,让我陷入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境地。

这一次,我不再“写诗”,而是受《真三家店菜单》这篇大字报的启发,将文革中常用的对敌斗争词汇编成了两张药方。

七月一日晚上,我在清华园新水利馆墙上张贴了下面这张大字报:

#### 鬼大夫救鬼秘方

继《真三家店菜单》搜出不久,在蒯氏卧室我们又搜出一份黑帮密件:《鬼大夫救鬼秘方》。据查知,原《鬼大夫救鬼秘方》共有三十六剂(计)。六月十日,蒯大富见大势已去,恐泄露天机,乃焚火烧毁。后经蒋艾幽灵指点,从中取出“混战剂”、“败战剂”两贴,散发同党王铁成、刘才堂等。不久即在清华园刮起一股妖风,妄图赶走工作组,还蒋黑帮阴魂。现将秘方公布于世:

#### 序 第一页

本方乃祖上密传,溯源于日耳曼伯恩斯坦氏,业已一百秋之久矣。后经三世鼻祖尼基塔,佛号赫秃,传至中华,亦已十数春矣。辛丑年初,吾得传于八达岭三堡寺,乃悉心修炼,将祖传秘方“和平演变”成三十六剂,赐名鬼大夫救鬼秘方是也。

夫三十六剂者,虽各得其妙,然其核心皆为“夺权”也,此乃祖传秘方之根基。故三十六剂者,剂剂相通,变化无穷。举凡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或碰得头破血流、腰断骨折,或元气大损、神魂颠倒、气息奄奄,皆可试用“鬼大夫救鬼秘方”。且一经试用,无不百试百零。(即“效果等于零”也!)呜呼哀哉!

三堡寺鬼大夫蒯某于辛丑年

正文

第二十一剂《混战剂》 第七十九页

症状：头破血流，两眼密布血丝，狰狞可怕，经脉乱跳，尚有少许元气。

药方：上味：铁制大棒五条，狼心狗肺三两，政治投鸡（机）一只，狗血一盆。

下味：混水摸鱼三尾，指桑骂槐二两，无中生油（有）一碗，掺水三倍。

膏药：左派画皮、美女蛇皮、笑面虎皮（应与汤剂同时使用）。

煎法：煽风点火后即刻趁火打劫，三日后釜底抽薪，将水搅浑即可。

服法：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呲牙咧嘴，血口喷人。不限时辰、剂量，见效即可。

注：上味供死心塌地、病入膏肓者服用。下味供中毒很深，病已极重者服用。

第三十四剂《败战剂》 第一〇三页

症状：气息奄奄，双目无神，马脚外露，经脉微跳，贼心未死。

药方：上味：花岗岩三斤，鸵鸟蛋一对，阿Q，孤栗（立）各二两，烈酒一斤。

下味：金蝉脱壳三两，鸡毛蒜皮二分，泡蘑菇，驴皮膏各四钱，眼泪、鼻涕、口水混合液三碗。

膏药：赖皮、扯皮、牛皮（与汤剂同时使用）。

煎法：用半湿稻草燃起浓烟幕（切勿起火），煎后草灰应置于东山下，且妥为收藏，来年即可死灰复燃。

服法：抱头鼠窜，装疯卖傻，张口结舌，吞吞吐吐，每日至少三服。

力九〇一班 叶志江公布

文中的八达岭三堡寺是清华大学干部疗养和开会的地方，将这个颇有神秘色彩的地名用作“鬼大夫”修炼得道的秘窟倒也妙在其中。

“鬼大夫”三字自然是蒯大富的谐音。

应当说，六月十日后对我猛烈的批判不仅让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词汇，而且让我对这些词汇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我奉命反蒯而进行“创作”时，我文如泉涌，各种妙句得来全不费功夫。

文学创作必须体验生活，那是千真万确的。

文学作品应当反映社会现实，这又是对的。在满园皆“鬼”的清华园中，“鬼大夫救鬼”理应成为一个很好的主题。

比《真三家店菜单》“高明”的地方是我将许多和食物无关的词汇巧妙地编入了症状、煎法和服法中。比如混战剂中的煎法：“煽风点火后即刻趁火打劫，三日后釜底抽薪，将水搅浑即可”。又如败战剂中的服法：“抱头鼠窜，装疯卖傻，张口结舌，吞吞吐吐”。既用了当时批判蒯大富等人的词汇，又和煎药或服药很贴切。

我自觉大字报中有些词句是神来之笔。贴完大字报后，我带着一点沾沾自喜进入了梦乡。不料一觉醒来，风云突变，我的那张纯粹是文字游戏的大字报竟然在清华园掀起了轩然大波。

革命群众不懂也不讲幽默，起码不同革命的对象讲幽默。

我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张贴大字报被指控为用心险恶，是用大字报中极为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尽管那一天并非我一个人贴出大字报。

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很难服人的。但炽热的革命热情使得高智商的清华才子们浮想联翩，他们用破解密码的技巧发现了我“隐藏”在大字报中攻击工作组和清华文革临时筹委会的“证据”。

在众多破解技巧中，被广泛接受的一个技巧正是我三年前编写“元素周期表诗”时用过的谐音方法。

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分别是叶林和周赤萍。我的混战剂的页码“七十九页”被破译（谐音）成“气死周叶”，败战剂的页码“一〇三页”被破译成“叶林散也”。这“散”字不仅可指为“散伙”，而且可以引伸为“落荒而逃”。又要“气死”，又盼其“落荒而逃”，可见我对工作组“恨之入骨”。

另外一个被人啧啧称奇的破解技巧建立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

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的三个头头分别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刘涛虽非美人，但女儿身是无疑的。贺鹏飞长得虎背熊腰，人称“小老虎”，而李黎风则被称为工程物理系的革命左派。于是我在混战剂中的三张膏药“美女蛇皮，笑面虎皮，左派画皮”便十分形象地被解读为影射攻击这三位清华文革初期的大左派。

除了这两个破解“技巧”外，还有人创造了一种让人如坠五里雾中的“计算数学”方法。他们通过奇妙的计算将“救鬼秘方”中的数字和反刍运动中一些日期联系在一起，以证明我和蒯大富等人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有牵连。

六月二十四日蒯大富和工作组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成为蒯大富等学生反对工作组的重大事件。有一张大字报对秘方中的数字作了如下计算：

第二十一剂“混战剂”是指6月24日大辩论是混战一场。请看“煎法”：“煽风点火，即刻趁火打劫，三日后釜底抽薪，将水搅混即可。”这就是说从21号（指二十一剂）起经过三天（指“三日后”）即24日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再看“第79页”，79小时即三天另七小时，从21日白天到24日晚上大辩论时，正好约79小时。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知道辞官回家的陶渊明和邻居们谈古说今时是否也欣赏过这一类奇文。即使有，恐怕也难析其疑义。

我自忖也曾名列清华“高材生”，但面对如此高智商的分析，却自叹弗如。我也奇怪世上有这等巧事，那么多页码不用，我为什么偏要选这两个页码？难道真的是鬼使神差？

其实，很多页码都可以被罗织罪名。所幸的是我没有选用“九十九页”，“一〇四页”或“一〇六页”等页码，否则就会被解读成“绞死周叶”，“叶林死也”或“叶林溜也”，岂不罪加一等。

更加值得庆幸的是工作组并不知道我在中学时便犯有“前科”：我不仅将元素周期表谐音成两首诗，而且将数字“三七”谐音成“伤茜”。

按照文革时陷人于罪的逻辑方法，周期表诗中“伤茜”两字是数字“三七”的谐音足以证明救鬼秘方中的“七十九页”就是“气死周叶”的谐音。这道理如同一个是英译汉而另一个是

汉译英那样简单明了。

我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汗，极为担心工作组会到我就读的中学去“内查外调”。

历史上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几百年后，清华历史系毕业的老学长吴晗写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前夕被解读成影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本人在文革时被迫害至死，从此神州大地上生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文字冤案。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救鬼秘方》一文当然是铁证如山地被定为反党反工作组的反革命大字报。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亲赴我的女友家中，向她的父亲，一个党的高级干部，通报我的反革命情节。两人连夜将我女友叫回家中，向她申明大义。第二天，女友被迫对我反戈一击，按照“周叔叔”的要求向我宣布从此“各走各的路”。

四面楚歌之后，霸王别姬是必然的结果，这是早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然而，历史也一再证明人类的良知永远不会完全地泯灭。当我百口莫辩，成了孤家寡人时，我的同班同学章曾煜不畏高压，对我表示了同情。他告诉我他不相信那些按在我头上的罪名，鼓励我“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当我的女友向我宣布从此“各走各的路”时，我微笑着接受了这一打击，心灵深处有一种彻底解脱，再无牵挂的感觉。但在章曾煜对我表示同情时，我流下了眼泪，泣不成声。

因为父辈大多是上海的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文革前章曾煜在政治上遭到歧视，直到文革前夕才在我的“帮助”下加入共青团。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当人人都在“痛打落水狗”，平时不关心政治的章曾煜却凭他的良知表示了他的异议。

我从未和女友口中的这位“周叔叔”打过照面。原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在他的《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中对周赤萍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在院子西边的走廊下，周赤萍找我和胡健谈话。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衫，趿拉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坐在走廊的栏杆上，习惯性地用扇子拍打着他的后背和前胸，俨然一副大部长的派头。

然而造化弄人，四年后周赤萍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除了为林彪进行反革命串联活动的罪名外，他在一九六〇年写的一篇文章《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也使其备受指责，说他在文中极其肉麻地吹捧林彪为天才和统帅，犯了触怒毛泽东的大忌。据说文革后山东省委一个书记去看他时，他直哭，很觉得委屈：“一篇文章就要了我的政治生命”。

在“一篇文章就要了我的政治生命”这一点上，我和周赤萍倒是可以惺惺相惜的。

在我贴出大字报后不到一周，刊登批驳《鬼大夫救鬼秘方》的大字报选编第十一期便印发出来，供全校师生作深入批判之用。

真的要感谢工作组诸位领导的革命热情和办事效率，让我的“秘方”能流传于世。

作为工作组的核心人物，王光美责无旁贷地亲自审查对我进行全校大会批判的发言稿，并和准备在大会上批判我的学生一一握手，让那些学生备感荣幸。工作组组长叶林在后来做检讨时披露，因为我的这张大字报和我曾是清华党委的红人，工作组认为已被打倒的清华党委可能是蒯大富反工作组的后台。

我在《鬼大夫救鬼秘方》中说蒯大富“妄图赶走工作组，还蒋黑帮阴魂”，而工作组却因《鬼大夫救鬼秘方》一文而猜疑“蒋黑帮”是蒯大富的后台。

严肃的政治斗争有时和滑稽的天方夜谭是相通的。

我曾经很纳闷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是真的相信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还是如刘少奇所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抑或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如毛泽东所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呢？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我在清华大礼堂遇到刘涛，她戴着一个大口罩，大概是怕被人认出来。但还是有人认出她而围了上来。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不礼貌的事，便掩护她从一条小路脱身。分手时我告诉她我就是叶志江，并问她我像不像反革命。她面露惊讶，并低头表示惭愧之意。

不久，刘涛在她那张很著名的大字报中特意提到了她和王光美关于我的一段对话：

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

看来，当时王光美等工作组领导是真的认为我的大字报有攻击工作组的动机。否则，何以解释她听到我在外地被扣的假消息时会脱口而出“叶志江该扣”？这也难怪，事隔多年之后，还有许多清华校友向我问起“七十九页”是否真的就是“气死周叶”。

无论是在一九六六年，还是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张大字报没有攻击或影射任何人，它甚至也并非攻击蒯大富的，它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或许，文革初期一大批青年学生被荒唐地打成反革命也应成为否定文革时需要反思的一段历史。

~~~~~

## 【往事追忆】

### 康生整人目击记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对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作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头子和文革顾问，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证据，经常偏听偏信，信口开河，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这点，笔者本人深有体会。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被他说成是大叛徒、国民党特务，受关押迫害十多年。原山东省老省长、文革前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发指。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临清，1932年临清师范毕业，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差点

被军阀韩复榘杀害。国共合作后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任鲁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英勇杀敌，被誉为“赵子龙”。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任2野5兵团17军军长兼政委，进军大西南。1953年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吕正操），1955年任山东省委第三书记、省长。1958年因“右倾”被贬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平反后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

1968年1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报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 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垮台。

关于康生是一个“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时，同王力展开了讨论。王力认为，康生晚年的确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他拥护中央对康生的处理决定。他甚至怀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对某些人和文章对康生的问题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全盘否定，说什么康生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样说法不对。康生入党后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一道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一口气杀了顾顺章全家十一口，尽管残酷了点，但可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错整了一些人。（作者注：共产党搞运动什么时候没有搞扩大化？）对此，康生负有很大责任，但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是有责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个人身上。

王力说，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也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主席和江青结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说介绍人的话，应当是总理而不是康生，康生仅负责审查，没有欺骗主席。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嘛！当然，康生是欢迎主席和江青结合的，老乡嘛！主席当时那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众。如果从历史上全盘否定康生，我们党的历史就没法写，你共产党内原来是那么黑暗和肮脏！笔者说为什么康生临死之前突然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怎么解释？王力说，这个问题真正是历史之谜了。

~~~~~

## 【难忘岁月】

我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八章：“康生为我撑船”，标题为编者所加。）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泉路上。班长就是挂名的林彪，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

我是一个候补的特殊人员。去北京学习的人员中本来没有我。后不知为什么，康生在开学后二十来天，又决定让我到中央学习。到学习班后，只是感到学习班很大。在里面学习的学员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学习班里，不管职务高低，不管工人、学生，一律平等。吃一锅饭菜；同进一个大浴池洗澡，大家把衣服一脱，不分将军和士兵；不分高贵和卑贱，都是男人，一律平等。伙食相当不错，每天有一架运输机给学习班从广州运送新鲜蔬菜。许多人都吃胖了，不过，我除外。



学习班里，多数是团以上的军队干部，这些干部几乎犯了同一个错误，都是在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后，犯了支一派，压一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的错误。其次，就是地方的造反派头头，这部分人比较杂，有工人、学生、一般机关干部。这些人中，有保军队的，也有炮轰军队的。保军队的和军队大多数将领们，都站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而军队造反派和炮轰派的群众是当然的革命动力。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才明白，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的用意。就是要我通过学习，与自己和省军区领导们的错误划清界限。

学习的方法是自学，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相结合。平时以自学为主。学习的内容是以毛泽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为主，结合学习有关社论文章。

由于我是后补学员，前面学习情况不了解，从学习进度上看，我肯定是落后了，我要多用些时间，将拉下的课程补上去。幸运的是，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陶健提前回合合肥搞大联合，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晚上开点夜车，落下的功课很快补上。

学习总的说来并不紧张，晚上一般不开会，可以自学，也可以串门聊天，交流学习“心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军区后勤部一位协理员房间闲聊，他告诉我军区第二政委宋文不学习的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军区开干部大会，宋文在会上作报告，稿子是秘书写好的，他念稿子时，居然将“同志们好”读成“同志们女子”。把“好”字读成“女”和“子”两个字，结果把整个会场搞得哄堂大笑。当时，我以为这是丑化宋文的笑话。时隔不久，宋文在一次检讨会上居然读出了更大的笑话。文革期间，什么人讲话，写文章都要在开头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宋文那次检讨，引用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这一段。结果，他把这段语录读成“革命请客不吃饭…”，下面呼口号：“宋文篡改毛主席语录！”宋当时也发现不对，急忙改口，后来竟然又读成“革命吃饭不请客”。说来也怪，这时，下面没有人呼口号了，大家都在捂着嘴笑，直到第三次宋文才把这段毛主席语录完整地读完。

由于晚上时间比较宽裕，我利用晚上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这本著作里，斯大林也多次称列宁是“天才”，但斯大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列宁主义诞生的必然性。我把这本书的基本思想与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联系起来。总觉得林彪说的“毛主席同志天才地…”，这里的“天才”二字太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所以，在一次学习《再版前言》发表一周年的讨论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再版前言》中的“天才”二字，发表几句议论。我记得当时发言的大意是：《再版前言》中说“天才地继承、捍卫、发展…”，我认为“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为一种思想，他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我把话说到这里时，发现大家本来比较从容的表情，一下子没有了。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到了禁区，赶紧补充说，现在林副主席工作太忙，我相信他以后有空了，一定会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样，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这又是学习的另一“新成果”。我的发言结束后，会上既没有评论，也没有谁批判。不知别人有什么看法和想法。会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好像我什么也没说一样。但到了一九六八年，这个“新成果”成了几乎要炸死我的重磅炸弹。这是后话，以后再叙述。

学习班里除了自学和讨论外，定期由中央领导来给学员作报告。萧华、杨成武等更高级的军事领导都给我们上毛泽东思想课。中心内容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自己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些课程无非是让我们掌握大批判的思想武器。学习班除了看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等，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安徽大批判的对象，当然是严光、宋文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他们的错误，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压制“八·二七”，利用军委的“八条”命令，镇压军内的造反派。“一·二六”夺权和军管后，支“G”压“P”。在这样的批判氛围里，我既要批判，又要检讨，总要把两种灵魂集于一身。时而要批判严光、宋文利用宣传车压制“八·二七”，时而又要批判自己是怎样

和严光、宋文他们“穿一条裤子”压制“P”派。就这样，我带着两套面具，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舞台上表演了四十天。

一九六八年的元月中旬，学习班的任务基本完成，为了鼓励学员回去后，把学习的成果变成行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学习的各地学员。在接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他大步流星地在舞台上走了个来回，最后停在舞台中央准备照相。这时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两边让，最后，舞台中央只剩下毛泽东和林彪。为了纪念这次接见，每一个学员赠送一张这次毛泽东和林彪接见的大型相片。后来由于林彪出事，要求销毁林彪的形象，送给我的那张相片，也不知被藏到哪里去了。

就在毛主席接见我们的当天晚上，李德生到学习班看望安徽学员。结束后，李德生把我和曹再凤单独留下，向我们转达康生的讲话。李德生说：“主席接见后，康老（指康生）把我叫去谈些事情，最后康老要我转告你们，你们写给他的信收到了，他原打算找你们两个单独谈谈，再做做工作。后来，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他让我转告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给康生信的底稿还在，做附件附在书后）

李德生转达了康生的意见，这意味着康生收起了撑船的杆子，我和康生之间的直接思想碰撞画上了句号。

学习结束了就回合肥。回来以后干什么？我却很茫然。但回来那天，合肥市居民的夹道欢迎，实在让我感动。从北京回来的学员都是站在大卡车上，长江路两旁的市民前拥后簇地欢迎归来的学员。从拥挤程度看，最少有一、二十万人。后来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前来欢迎？不少“八·二七”的同学说：一方面是十二军组织的，更多的人是自发的。他们说，跟着曹、梁，干了一年多，还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利用这个机会看看他们，听到同学们的回答，在我心灵深处得到莫大的安慰。

~~~~~

【自由论坛】

平民阶层的文革史提纲（草稿）

• 老 田 •

叙述框架：建议把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博弈过程看待，对平民参与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话语权争夺作为主要线索展开。

叙述时间：建议简史从1956年的八大开始，把视野扩展到国家管理过程内部的张力；叙述至伤痕文学兴盛为止，体现文革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弈过程的全部画卷，也要涉及今天的争论，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参与和表现突出出来。

关键词汇：建议在文革叙述中间，统一使用几个比较关键的词汇，这样就比较能够方便的建立叙述。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平民阶层；分化与整合；体现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分布状况和服务方向的词汇：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思想格局。作为阶层竞争要素的有形资源（包括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和无形资源（包括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

以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为主线，以十年文革为主要场景。在前面加上毛泽东与党内对立面分歧的背景，文革终究是社会关系紧张引发党内关系紧张，最后需要群众出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群众运动过程带来的压力，本身激发当权派的全力反扑，引发一场严肃的政治博弈过程，持续十年之久；后面加上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言说努力，“非毛化时期”对造反派和毛泽东的妖魔化过程，仍然是在思想格局里面消灭对立面的诉求在起作用。今天对文革的妖魔化努力，实际上是从属于“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的需要，目的是论证历史已经终结，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 一、文革前党内紧张关系的缘起

八大之前已经完成的三大改造，已经排斥了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可能，中国要经由权力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去实现工业化进程的道路。

权力主导下的高积累政策，排斥了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的空间，挤压了以“物质刺激”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运用的空间，这使得管理事务增加，同时控制权急剧增加的官僚精英群体却缺乏足够的剩余激励。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之后，确立了“政治挂帅”的干部遴选规则，使得党内强势群体在新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间处于边缘化状态，一线工作的党政精英受到相当的压力，“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都是强势群体的发难。工作风险与承担的任务是高度正相关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和单干风的顽固重演，是官僚精英群体基于减少工作量和减少工作风险的双重考虑。1956年的“百花运动”，毛泽东试图让知识精英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批评，形成一种健康的压力，知识精英群体一个方面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准备好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最后形成反右运动并扩大化，扩大化是官僚精英群体捍卫自身优势地位作出的保护性反弹，本身是降低工作风险的实践性制度安排。

毛泽东在1956—1958年的大力鞭策，在几十次讲话和思想工作之后，亲自做秘书工作总结工作方法六十条，还要辅之以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运用（例如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才足以推动官僚精英群体承担“以权力排斥资本”主导工业化的重任。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实就是这个要求多工作与反对多做工作的争执在理论上的一次解决。

把新中国建设的大政方针总结为“三面红旗”，并大力宣传到民众心目中间，实际上也就是援引群众舆论的力量肯定新中国的发展路线，作为一种压力去推动党内精英群体的工作。简单、明了和政治正确性体现在一个口号中间，符合民众的认知水平，群众的广泛接受本身会形成一股政治压力，再转而向上传递压力。

毛泽东在完成了这样的重大工作之后，退居二线。作为教员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进行的技术和工作方法教育，以《工作方法六十条》为代表，基础判断是干部们的主要问题和局限存在于工作方法和经验不足。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广泛宣传是一个转折点，这已经是通过宣传在民众中间确立“政治准确”的标准，以此去隐性规制和围堵官僚精英群体的越轨。到一九六〇年信阳事件之后，中央文件已经改变了干部问题的性质判断，不再认为干部中间的不足和消极表现来自技术和经验的不足，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错误，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显示出革命话语的强大和继承性。在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要追究干部们的贪污和工作作风问题，一是通过工作队的引导去强化和建立贫下中农和工人协会，以期提升民众的组织 and 力量。教员的毛泽东先是着眼于技术教育，后来转为重

视政治教育和启蒙。

## 二、党内紧张关系的加剧

刘邓等人简单地援引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1958年轻率地在党内开展“树红旗、拔白旗”运动，并把这个戴政治帽子的方式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运用，结果制造出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浮夸风”的恶性蔓延。浮夸风使得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信息成本的急剧上升，协调和管理更加困难，基本建设规划服从出各路诸侯出政绩和争项目、资源需要，高指标的压力达到了毛泽东都难以控制的地步。

大跃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两次郑州会议纠偏，上海会议压指标，庐山会议讨论19个问题。这个压缩任务如此艰难，仍然来自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背后的压力，各地诸侯都拒绝放弃高指标，这是刘邓简单援引政治压力的后果。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对刘邓他们的支持，基于“学费”（特定官员无法被简单替换的门槛）的考虑，一种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建立，其成本和代价是非常庞大的，毛泽东对此有很深刻的体认，因此倾向于原谅刘邓他们。争取他们在挫折后继续前进。1959年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仍然是一个政治权力体系内部的整合运动，刘邓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一律给予打击，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左右问题，而是现实政治中间的站队问题，受打击的官员是建立刘邓管理权威的“成本”。

毛泽东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要是基于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差异性的认识。毛泽东说中央只是一个加工厂，不出任何材料。地方积极性问题与中央企业在1958年很短时间内下放，人财物权的迅速下放，加重了后来的混乱。毛泽东对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悔过，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快速下放权力承担了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高调批判分散主义，意思是中央没有任何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各地官员的分散主义，自行其是，不听指挥。接着开始试办托拉斯，并进行“三统”，所谓的僵化的旧体制就是在这个纠正分散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运输力量等从工厂高度集中到交通部门。

有了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胜利的资本，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根基，刘邓等人认为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整合程度已经上升，无须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也可以应付党内的反对力量，就开始按照自身的意愿对重大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1962年毛泽东指称的“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运动，目标是多重的，一是要减少官僚精英群体的工作量，至少是把农业交由个体小农去经营，二是要减少工业化过程的动员压力，进行了异乎寻常的精简和下马运动；三是要进行官僚精英群体的内部整合，不加甄别地一律平反，等同于皇恩大赦。

在三年困难时期，基层干部的一些消极面暴露得比较清晰，干部队伍在高层和底层反映的问题都是严重的。毛泽东在1963年开展了两场互有联系的运动，在高层借助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对高级干部进行教育，根据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实际上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讲课和讨论，重申共产党的服务方向和宗旨，反驳“三和两全”，提出共产党还是要为人口95%的人民谋福利。在基层进行四清，试图规范干部的行为，重新建立群众与党政机关的有机联系，重新建立工会和贫协组织，谋求把群众的意志和力量，以程序化的方式传递到基层干部的行为取向中间去。“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管理”最后变成“清经济”，四清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有限目标变成无限目标，明确目标变成难以把握的空谈，主持者和参加者失去主导能力，运动变得很混乱，按照任意目标进行。桃园经验对各地高级干部的吸引力，

驯服工具论的批判过程，本身是指向整合内部、排遣工作风险的强烈意愿。

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歧已经明朗化。沿袭马列话语对当权派的有利成份，也因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容颠覆，对血统论的批判无法进行到底，马列一套话语不足以保护和支撑毛泽东的努力过程。

### 三、分歧扩大与群众运动的决策过程

1965年11月10日公开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毛泽东自己视为文革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林默涵回忆文章说北京市委数次打电话询文化部求文章发表背景。

二月提纲试图把争论淡化为学术问题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是政治路线的分歧，不是学术问题，是明明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直到五一六通知的内部发行。这是文革的第一阶段：文艺批判主导权的争夺在高层进行了两个回合。

各级各地官员对于文艺批判的冷漠和压制，使得毛泽东最终放弃了体制内程序批判解决方案，决心直接诉诸民众，要求民众自己出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为了扫除对群众的压制和有组织舆论的误导，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控制舆论，并建立临时性的工作机构收集运动信息。

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是通过批发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政治性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三大步骤。1966年8月8日十六条通过。11日毛泽东接见上访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是文革期间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毛泽东自己的影响力，是强势官僚精英群体力量的一个重要平衡因素。

1957年毛泽东没有准备好与官僚精英群体分裂，所以承认“引蛇出洞”，1966年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在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王力等人说“哪怕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压力传递到官僚精英群体之后，引发本能的反抗。调动工人农民反学生，派遣工作组进行压制，转移运动大方向，搞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排除干扰抓游鱼反右派。把文革运动方向转向社会下层。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打压，直接造就了最坚定的对立面——由早期少数派发展起来的造反派，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亮明自己的旗帜，成立自己的政治性组织。阶级斗争和社会分化，总是精英阶层制造并主导的，革命和造反的参加者都是被逼的。

### 四、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讲话，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后来被红旗杂志13期社论总结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话语权开始保护少数派，同时攻击官僚精英群体，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掌握的“两报一刊”，一度成为造反派方面的舆论支持力量。

10月9—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亲自出面给高级党政官员作政治思想工作，

要求他们不要对抗群众运动和大民主，不要在群众中间制造分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陈伯达讲话《文革中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结果是会后官僚精英群体进行第一次集体行动：罢工。张体学从北京回来之后穿上军装躲进军区招待所，安排各级干部脱离工作岗位去建立“三道防线”，实际上官僚精英群体进行了有组织的大罢工。

干部大罢工带来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严重可能，这个时候就要求迅速组织新的政府那样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普遍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避免社会真正陷入失控的局面。有此要求军队“支左”和造反派“夺权”，造反派当时已经形成有的组织力量固然要为恢复社会秩序作贡献，而军队作为唯一的全国性有组织力量也要为避免社会陷入混乱而“保驾护航”，结果就是军队从国家机器的后台走上前台，为恢复社会秩序努力。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军事力量和部分愿意合作的干部都参加火线指挥部，共同来应对党政系统官僚精英群体罢工的局面，以此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临时性权力机构。而后来的三结合革委会，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临时性的权力机构长期化和固定化。

秩序的重要性与革命的重要性发生了冲突，在官僚精英群体选择罢工之后就显得特别突出，这个时候为了秩序不得不牺牲革命，无秩序社会的成本太高，即使为了革命的名义也不容许付出如此庞大的代价，革命的成本和风险是有底线的，在底线上秩序高于革命。到底是谁主沉浮，干部罢工过程就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反五反运动中间，资本家主导的工业萧条，也曾经促使共产党政权作出临时性让步，这个争论最终是在1956年的欢迎改造结束，资本不可能强于话语权和政权的结合，布罗代尔曾经证明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在夺权之后，基于政治影响力的排他性竞争，造反派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部分地区的官僚精英群体明智地利用并扩大了造反派之间的裂隙，争取到部分有组织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意愿。

军队支左和军委八条，复活了官僚精英群体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冲动，结束了短期的徘徊。二月逆流不是怀仁堂内斗斗嘴那么简单，而是体现了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1966年8月20、21日两个通知，曾经取消了官僚精英群体运用国家机器捍卫自身利益体现自身意愿的可能，而军委八条则给予了这个政策空间。全国性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就是国家机器复活去体现官僚精英群体意志的体现，1967年3月17日午夜，武汉钢工总500多个基层组织的头头被抓。官僚精英群体的重大优势在于他们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

1967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安徽七条，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取消了军委八条赋予官僚精英群体的权力。毛泽东非常清楚军队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仍然热衷于政治思想工作，在四月初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系统地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作政治思想工作，江青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周恩来讲要保持革命晚节。从此官僚精英群体又失去了公开援引国家机器的合法性，竞争开始转入“非法”的地下渠道，武汉开始集训基干民兵队伍。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国家机器无法正常援用就建立第二武装。背后是官僚精英群体竞争意志的强烈和组织技术的纯熟，政策空间和现实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努力方向。

武汉720事件发生不是偶然的，陈再道的个人秉性，粗暴不善于做分化群众的工作，军区早期的两起自杀事件无法交代，没有能够争取到造反派组织作为支撑不得不建立民兵组织，对立发展到抓中央代表其实就是选择过分非法化竞争手段的自然反应。

已经实现了相互勾结或者整合的官僚精英群体，其竞争优势难以动摇，这是文革必须转入

整体性退却的原因，力量对比不行就必须避免速决战，撤退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作为政治竞争过程，需要平衡对立面的影响，瓦解对方的意志和缓和对立是同一政策，抛出王关戚和称陈再道为同志是同一考虑。造反派整合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军队成为唯一有能力恢复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无法被替代。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分歧和落差就在于此。武汉的“北决扬”，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都是作为“屁派思潮”的重要体现。造反派内部的政治分化过程，已经相当深入和稳定，不再是局限于政治影响力的竞争关系，而是涉及到权力的服务方向与性质问题。大联合之后成立革委会。原来的多数派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原来的少数派认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未实现，一方说“革委会就是好”，另一方说“革委会好个屁”，好派和屁派的分歧是全国性的。

三结合之后各级政府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重叠叠的行政机构，工作岗位大幅度精简，多余的党政干部无处安身，成为城市里多余的人。武汉市委市政府原来2000多人，革委会成立初期只有96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几百人；中央国家机关原来5000多人，成立革委会和领导小组之后只接纳不到1000人，大部分干部组织成建制的队伍下农村，五七干校，在职干部也要去干校轮流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后来被称为劳改，下农村就是后来宣传的牛棚。1969年国家安全形势突然恶化，10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疏散，大量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都转移下农村。

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中间，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而对革委会最不满的因素中间，旧的党政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已经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敢有所表现，革委会需要排除的干扰因素就是造反派。同时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原来的当权派影响力与百万雄师组织一起陷入瓦解，新的武汉军区领导人离开了造反派组织力量的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所以出现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三天两头找造反派勤务员叙话”的情况。武汉基层工厂和单位的革委会很多是通过海选而成立的，多数都是把持在造反派手里；军队干部的优势是具有全国性的组织和中央的支持，而造反派的优势则在于基层群众中间的拥戴。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部分夹带着“捅马蜂窝”（破坏和撤换基层革委会成员，是军宣队去夺造反派的权柄），矛头所指就是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造反派发起“反复旧运动”，指责军队干部打击文革的新生力量，复辟旧政府。中央以周恩来为首出面处理各地的情况，决定支持谁和反对谁，结果是各地造反派受到普遍弹压。

虽然受到被周恩来全面指责的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但是不满情绪和对立还是一个现实，影响到各地的革委会工作。一九六九年发布的“九二七指示”是为整造反派立法，十一月份开始以造反派头头为对象办“中央学习班”，全面隔离造反派的组织骨干，武汉有一千多人被各个单位的当权派选派去北京，等到他们半年之后从北京回来，基层革委会已经实现了大换班，保守派上台了，政权性质的转移与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政治诉求一致。

毛泽东提出“吐故纳新”和“建党50字方针”，想在组织和党建中间去接纳造反派，但是“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的方针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结果是后者被各级当权派落实了。一九七〇年在北京中央学习班里，陈伯达作了四次以上的讲话，扭转了学习班的政治方向，从原来所说“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要求“造反派消除派性”，转为“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造反派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政治博弈过程，这个清理五一六运动，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体现当权派意愿的“秋后算帐”运动，最终的结果是全国打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的组织力量和骨干份子基本上被一网收尽。清队和反五一六的组织力量是在造反派被隔离到北京期间，革委会换班实现的，而运动的“动力”基本上是从前的保守派与军队系统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成就，本身也符合前党政系统官僚精英群体“秋后算帐”的意愿。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那些清理五一六最积极的政治人物直接受到打击。压力传递到林彪身边，诱发了九一三事件。1972年批极左运动，毛泽东裁定为极右，左与右并非单纯的政治主张，而是首先对应着政治现实中间特定群体，社会不安定和政府失职的原因，是毛泽东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而不是处在五不准学习班中间的造反派这样的“极左份子”，社会经济问题上的不足是当权派犯了新的错误，造反派没有责任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973年初开始实行“权归政、兵归营”，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政治格局中间是支左干部不仅有与造反派对立的“民愤”，也有很多的“官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造反派都是“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三结合的革委会里面就只有军队干部掌权才是天然合理的。文革分化了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

支左干部离开党政系统之后，空出的大量岗位优待充实，一个选择是造反派“补台”，还有一个选择是老干部恢复工作。1972年的一个星期之内，陈正人和曾山两个正部长级干部，一个星期内先后在干校去世，利用这个舆论，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

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从前造反派受到长期压制而形成并强化的竞争意志，在运动期间磨练出来的组织协调技术，使得1974年的造反派相对强大。武汉“潮流派”“议会派”和“招安派”的相互配合。选择“走后门”问题的高明与舆论主导能力。政府官员内部弱化的表现为“三大讲”运动，六条。

1974年邓小平说新干部都是座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经验，需要下基层去锻炼，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从1973年到1975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到超过文革前，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谁处在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内部岗位上，谁能够填补支左干部离开的空缺，乃是未来政治竞争胜败存亡的关键，双方都没有疏忽大意。邓小平充当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过程，在妨碍造反派“补台”和体现官僚精英群体意志的努力，直接造就了造反派1976年批邓的积极性和坚决性。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一些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广大干部生活水平下降，敢怒而不敢言”的政治意涵，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又有着强烈的竞争意愿和组织技术，谁能够主导这样一股力量，谁将能够主导中国的政治局面。毛泽东也同样认识到“林彪之类上台，复辟修正主义很容易”的现实力量基础。后来的“非毛化过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强大的群体及其强烈的意志和主导力量。

文革过程中间，无组织多数的弱势有很充分的表现，群众难以实现政治整合形成一股力量去主导社会局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力量的增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抵消了控制权的作用，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效率，因此精英们认为“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只能是动乱”。

对于强势群体的行为规则，法律是无效的，批林批孔批礼治，乃是针对法律难以制约精英群体的无奈。与有组织的少数保持一致，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宁可犯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一方面是感情和阶级认同，一方面是对政治力量对比的理性把握。

## 五、文革政治博弈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继续

邓小平主导的“非毛化过程”中间，历史决议表述的是党内是非要重新评说，而伤痕文学



和《历史在这里沉思》表述的是精英阶层感受和意愿。文革期间民众分歧的相对稳定性，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歧是一直稳定的，与此相对立的民意也是很强大的，打倒四人帮固然有民意支持，打倒邓小平也不例外，精英们的文革叙事中间仅仅把四五事件和西单墙装裱为唯一的民意。

非毛化叙述树立所有的高级干部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以平衡毛泽东的影响。改写八大报告的背景作为毛泽东违反集体领导的证据。重新叙述1959年的庐山会议，说成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专断发展的起点。把国家管理过程中正常的监督和批评说成是政治斗争，似乎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内部除了政治权力斗争之外，就没有了思想整合需要。这也是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意愿：他们的政治利益不能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实际上是拒绝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邓小平亲自为学术界定调子说“制度决定一切”，没有好制度好人也办不成好事，除了拒绝管理的意愿之外，其另一目的是把执行者的责任撇清，把所有责任推卸给决策者毛泽东。官方的说法把毛泽东说成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在，举全党之力不足以抗拒之。同时根据分工，所谓民间的精英们又说毛泽东在党内根本吃不开，其领导地位受到刘少奇严重威胁，以至于毛泽东需要发动文革来搞权力斗争，从他夺回权力。

与死去的毛泽东进行争论不仅仅在纸面进行，毛泽东主导新中国建设的道路，毛泽东主义的两条腿是“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以分田到户方式去论证只有单干才能增产，完全不提化肥对新时期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是主流学术界和舆论界约定俗成的惯例，完全忽视限制农业生产的多种条件，本质上是复制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一个新版本。说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必然带来浮夸风，屏蔽掉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间刘邓等人简单的以政治手段实施管理，在路线和作风之间忽视传递机制，实际上是为了洗清执行者的责任。

在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完全不提政治局常委在中苏论战中间一致通过的表述：“单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需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邓小平在“能反修、会反修”中间的理论贡献。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后果实际上是否定了阶级分析法，也实际上否定了结构分析法，把马克思政治学变成了纯粹空洞的职业利益需要而存在的话语权。

最大的效果和最强有力的社会影响是伤痕文学造就的，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反党”，在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处于“不争论”的同时，伤痕文学独立地改变了社会舆论氛围和评价体系。精英阶层出来表述自己的黑暗感受和意志，利用了毛泽东时代他们没有走极端的资源，因此在民间还能够激起同情和支持。对于整体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调整，也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实现的，给工人农民以短期利益，在政治整合过程完成之后将失去长期利益。今天这个后果才为普通民众所感受到，时间差与信息不对称的利用是很充分的，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大贡献。

## 六、 文革叙述涵义的历史性转变

1980年代早期，否定文革是政治是非重新评说，叙述中间突出强势群体的黑暗记忆。这是作为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一种体现。抨击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的混乱和黑暗，在中国特定的时间序列和视野里，本身是为了建立起精英阶层垄断一切权力的合法性，在抨击所谓的封建法西斯中间是全面否定民众的权力，真正的目标是精英阶层对平民的专政。

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毛泽东，到否定新中国的建设历程，最后否定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一个努力方向，党内非毛化专家们的与时俱进。在海外精英们说逻辑

上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如果今天的道路的就是最好的，是无可代替和超越的，那么共产党的革命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要换一批人去当官掌权吗？

原来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今天的新领导人基本上都不再背文革的包袱。

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们抹黑文革和毛泽东的努力目标，是要在论证“历史已经终结”的潮流中间，挖掘本土资源，去帮助建立全球性的“文化专制”。

同时，中国资源分配高度集中建设起来的社会排斥机制覆盖越来越多的人口和阶层，引发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强烈质疑和反弹，使得主流知识精英们面临着新的“稳定任务”，他们需要更大的工作力度，去遮蔽人们的视线，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妖魔化力度增加，是为了阻止人们去思考“另一个世界是否可能”的问题。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五日

□ 原载“中国文革研究网”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